

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一

唐雅

唐詩

貞符

獻平淮夷雅表一首

淮夷詩曰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
淮夷注云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

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平吳元濟在淮
蔡故曰淮夷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

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
長六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意之類

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本然聲賡德
於盛漢之表談數云論柳文者皆以謂

封建論退之所無
伏違書版奏十有四年

柳宗元集

第一册

自元言臣負罪竄伏違書版奏十有四年

部負外郎郎官掌尚書版奏公永貞元年自禮
部負外郎郎官掌尚書版奏公永貞元年自禮

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一

唐雅

唐詩

貞符

獻平淮夷雅表一首



柳

宗元集

第三册

詳註詩曰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
淮夷注云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
 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平吳元濟在淮
 蔡故曰淮夷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
 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
 長云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
 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舉然聲唐德
 於盛漢之表談藪云論柳文者皆以謂
 封建論退之所無
 自元言官有罪寬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

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公永貞元年自禮
 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文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

新刊增廣百家詩補註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一

唐雅

唐詩

貞符

獻平淮夷雅表一首



淮夷詩曰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
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

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平吳元濟在淮
蔡故曰淮夷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

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
長云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

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舉然聳唐德
於盛漢之表談藪云論柳文者皆以謂

柳

宗元集

第四册

臣分元言臣負罪竄伏違世書牋奏十有四年

部負外郎郎官掌尚書牋奏公永貞元年自禮
部負外郎郎官掌尚書牋奏公永貞元年自禮

柳宗元集

第一册

中華書局

柳宗元集

第二册

中華書局

柳宗元集

第三册

中華書局

柳宗元集

第四册

中華書局

柳宗元集

(全四册)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天津新華印刷二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49⁵/₈。印張10 插頁·1,000千字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天津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1,000册

統一書號：10018·407 定價：5.65元

前言

柳宗元（公元七七三—八一九年），字子厚，是我國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和著名的思想家。他祖籍河東（今山西永濟），人稱柳河東，曾貶官柳州，因又稱柳柳州。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，二十一歲中進士，二十六歲第博學宏詞科，授集賢殿書院正字，後又任藍田尉，監察御史裏行。貞元二十一年（公元八〇五年），與劉禹錫等一起參加主張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團，升任禮部員外郎。不久，革新失敗，被貶為永州（今湖南零陵縣）司馬。十年後，改貶為柳州（今廣西柳州）刺史。又四年，病逝于柳州，年四十七歲。

柳宗元一生，經歷了代宗、德宗、順宗、憲宗四朝，但他的主要活動是在貞元、元和時期。這時經過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，唐王朝已開始走下坡路，為舊時史家稱道的所謂盛唐時代已經一去不返。這場大亂以後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、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和各個集團之間的矛盾，不僅沒有緩和，而且都進一步激化了。藩鎮軍閥依然擁兵割據，並且從河北四鎮擴展到內地。這些藩鎮跨州連縣，「大者連州十餘，小者猶兼三四」，「既有其土地，又有其人民，又有其甲兵，又有其財賦」（新唐書兵志），「各擁勁卒數萬，治兵

完城，自署文武將吏，不供貢賦」(資治通鑑卷二二三)，父傳子繼，儼然成了與王朝中央分庭抗禮的獨立王國。在王朝中央內部，宦官專權也日甚一日。他們掌握中央禁軍，左右朝政，威懾皇帝，權傾海內。朝中宦官當權派和地方藩鎮軍閥既有矛盾，又相互勾結，狼狽爲奸，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。他們橫征暴斂，恣行吞併土地，造成工商蕭條，農村凋敝。在地主階級(宦官當權派和藩鎮軍閥本身也是大地主)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，廣大農民紛紛破產逃亡，農民起義不斷爆發。在階級矛盾激化、唐王朝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，地主階級中一些有識見的人物，爲了維護唐王朝的統治和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，起而要求抑制宦官和藩鎮的特權，維護以皇帝爲首的中央集權和國家的統一，革除一些喪失民心的弊政，使勞動人民的沉重負擔有所減輕，以利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恢復發展。柳宗元在順宗時和王叔文等一道所進行的政治革新，就是這種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。

德宗貞元年間，柳宗元在任監察御史裏行時，就和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結下了深厚友誼。王叔文當時爲東宮皇太子李誦的侍讀，經常利用機會和太子議論朝廷弊政，希望太子在即帝位後能有所改革。太子李誦對王叔文的政見頗爲賞識，所以當貞元二十一年(公元八〇五年)正月繼承德宗李适即帝位以後，立即起用王叔文、王伾等革新派人物。柳宗元被擢升爲禮部員外郎，深受王叔文的器重，是革新派的核心人物。他們執政後，便實行一

系列的革新措施，如罷黜罪惡昭著的貪官污吏，取締劫掠民財的「官市」和「五坊小兒」，免除正稅以外的苛捐雜稅，把長期被藩鎮壟斷的鹽鐵轉運大權收歸中央，釋放部分宮女和女樂，裁減閑雜人員，並着手接管宦官兵權（因遭抵制未能實現），等等。這些措施，打擊了以宦官和藩鎮為代表的腐朽勢力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。但是，由於宦官和藩鎮的勢力相當強大，革新派缺乏廣泛、堅固的社會基礎，所以這次革新運動在他們的聯合反撲下，很快就夭折了。以宦官俱文珍（即劉貞亮）為代表的宦官勢力，和以韋皋（劍南西川節度使）為代表的藩鎮軍閥勢力勾結起來，逼迫順宗李誦把皇位讓給太子李純（憲宗）。接着便對革新派進行迫害，王叔文被殺，王伾被逼死，柳宗元、劉禹錫等八人被貶謫為邊遠諸州司馬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「二王八司馬事件」。

政治上的失敗和被貶逐，在柳宗元的生活道路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。在這以前，年青的柳宗元在政治上頗有一番抱負，嚮往於「勵材能，興功力，致大康于民，垂不滅之聲」（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）。在理想幻滅以後，他便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轉到了思想文化領域，認為「賢者不得志于今，必取貴于後」（寄許京兆孟容書），渴望「能著書，斷往古，明聖法，以致無窮之名」（與顧十郎書）。他發奮鑽研經史諸子，「讀百家書，上下馳騁」（與楊京兆憑書），寫自己的體會，「以志乎中之所得」；遇到荒謬之處，他就常常「勇不自制」地進行批判，

「以救世之謬」(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)。他的文學性的散文和詩歌，大多是有感而發，或揭露社會黑暗，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，或諷時傷世，矛頭實指向腐朽勢力，或「長吟哀歌，舒泄幽鬱，因取筆以書」(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)，以寄托他的悲憤。長期的貶謫流放生活，使他比較深刻地觀察到社會的黑暗，體驗到勞動人民的疾苦，從而使他的作品有較豐富的思想內容。他留傳下來的七百多篇作品，絕大多數是在貶官以後寫的。其中有不少優秀篇章，在我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一直閃耀着光芒。

在政治思想方面，柳宗元主張融合先秦以來各家的政治學說，但他最推崇的是「堯、舜、孔子之道」。他的政治理想，是所謂「立仁義，裨教化」，「唯以中正信義爲志，以興堯、舜、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」(寄許京兆孟容書)。他表示自己「好求堯、舜、孔子之志唯恐不得」，「遇行堯、舜、孔子之道唯恐不嫌」(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)。然而，他並不專宗一家，而是認爲楊、墨、申、商、刑、名、縱橫、釋、老等各家學說「皆有以佐世」，主張「咸伸其所長，而黜其奇袤」；他認爲這些學派都是「孔氏之異流」，「與孔子同道」，主張把這些學說「通而同之，搜擇融液」，使之完全符合于「聖人之道」(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)。

柳宗元反對藩鎮割據、主張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，突出地反映在他的著名論文封建論中。他總結了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和分封割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，說明只有實行郡縣

制，廢除「繼世而理」的分封世襲制，才能作到「有罪得以黜，有能得以賞」，才能「使賢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」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。他把擁兵自重的藩鎮斥之爲「虐害方域」的「桀猾」，「叛將」，有針對性地提出「善制兵，謹擇守」的建議，主張把兵權和郡縣官吏的任免權集中於王朝中央。

柳宗元主張任人唯賢，反對任人唯親，特別是反對宦官專權。在六逆論中，他批判了左傳把「賤妨貴、遠間親、新間舊」看作「亂之本」的傳統觀念，反對用人看貴賤、親遠、新舊，主張只根據「賢」「愚」作標準。在送崔子符罷舉詩序中，他主張選拔人才時不僅根據辭章，還必須「觀其行，考其智」，看是否德才兼備，可以「化人及物」。他認爲宰相的一個重要任務，就是廣泛地「擇天下之士，使稱其職」（梓人傳）。在晉文公問守原議和桐葉封弟辯中，柳宗元還借題發揮，反對宦官參政和專權。

柳宗元早年懷着「致大康于民」、「利安元元」的抱負，被貶逐以後所盼望的仍然是「生人之性得以安，聖人之道得以光」，並且以「仕雖未達，無忘生人之患」與朋友共勉（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）。他嚴厲抨擊貪官污吏們對勞動人民的騷擾，要求給他們「蕃生」「安性」的權利（種樹郭橐駝傳）。在捕蛇者說和田家等詩文中，他深刻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疾苦，並寄予同情。針對當時「賄賂行而征賦亂」的不合理現象，他主張「定經界，覈名實」，實行「均

賦」，適當減輕貧戶負擔，增加富戶賦稅，以利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發展（答元饒州論政理書）。這種主張，雖然只是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，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。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時，在他的職權範圍內，也曾經作過一些對勞動人民有利的事。

在哲學思想方面，柳宗元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，在我國哲學史上有重要的貢獻。

唐代中葉哲學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，主要是圍繞着「天人之際」即人和天的關係問題而展開的。當時流行的神學天命論思想，適應宦官、藩鎮爲代表的腐朽勢力的要求，有利于維護他們的特權和既得利益，而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，則是革新派進行改革的思想武器。

柳宗元繼承並發揚了荀況、王充等人「元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思想」，認爲「天同瓜果、草木等自然界一切物質的東西一樣，是由渾沌的「元氣」構成的，一切都統一于「元氣」，不存在離開「元氣」而獨立存在的有意志的「天」（天說）。他指出「天」是「無營以成」，「無功無作」，是「陽氣」的無限積聚而成；陰陽二氣在無邊無際的宇宙間相互作用，「吁炎吹冷，交錯而功」，推動着宇宙的運動發展（天對）。在非國語三川震一文中，他駁斥了把地震看作

「天人感應」的胡說，指出天地山川、陰陽二氣都是「自動自休，自峙自流」，「自門自竭，自崩自缺」，「或會或離，或吸或吹」，地震就是在這運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自然現象，就好像蒸氣的「涌溢蒸鬱」和水力的「衝盪潰激」一樣。這些試圖從自然界本身來說明自然界運動的觀點，含有樸素辯證法的因素，是非常可貴的。

柳宗元認為自然界的「天」和社會人事「各行不相預」（答劉禹錫天論書），人的吉凶禍福，社會的興衰治亂，都非「天」所能主宰，而是「功者自功，禍者自禍」（天說）。他還認為，要「變禍爲福」，決不能依靠「天命」，而是「在我人力」（愈膏肓疾賦）。在非國語中，他以大量篇幅批判了國語一書所宣揚的天命論，詳盡地闡述了他的無神論思想。他甚至在給皇帝歌功頌德的文章中，也大膽地駁斥了董仲舒等人宣揚「天人感應」的符瑞說是以「淫巫瞽史」之言來「誑亂後代」，並且指出皇帝「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」，「受命于生人之意」，否定「君權神授」的反動說教（貞符）。在斷刑論、時令論等著作中，他還深刻揭露了「賞以春夏，刑以秋冬」那種把刑政制度神權化的荒唐。

對於歷代反動統治者宣揚天命論的反動目的，柳宗元也作了揭露。他指出：「力足者取乎人，力不足者取乎神。」（非國語神降于莘）「古之所以言天者，蓋以愚蚩蚩者耳。」（斷

刑論

在社會歷史觀方面，柳宗元認為，歷史的發展，既非由「天」意決定，也不是「聖人」的意志所能左右，而有其客觀的必然趨勢。在封建論中，他以進化的歷史觀分析了人類社會的發展，指出分封制的產生「非聖人意也，勢也」。他認為郡縣制之取代分封制，是不可改變的客觀趨勢。當然，由於歷史條件和階級的局限，他不可能揭示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和客觀規律，他的歷史觀仍然是唯心主義的。從封建論和貞符等文看，他所說的「勢」，實際上是「生人之意」的另一說法。他把「生人之意」看作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，而不懂得決定社會發展的歸根到底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。但應指出，他在當時能提出上述觀點，否定「天」和「聖人」創造歷史，也是難能可貴的。

在我國文學史上，柳宗元佔有重要的地位。無論是在文學理論或文學創作上，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

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之一，對當時文風的改革起過重大的推動作用。唐代古文運動，是一次提倡樸實流暢的散文、反對辭藻華麗內容空洞的駢文的文學革新運動。柳宗元針對形式主義的駢儷文風的流弊，提倡「文者以明道」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），強調文章要「輔時及物」（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）。他說：「文之用，辭令褒貶，導揚諷諭而已。」（楊評事文集後序）這就是說，要用文學這個武器來歌頌贊揚美好的事物，批判諷刺醜惡的